

書 評

張 光 宇*

孫衛國

《從「尊明」到「奉清」——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(1627-1910)》

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18 年，592 頁，ISBN 9789863503088

囿於部分研究者的中國本位、缺乏對朝鮮歷史的瞭解；加之在視野、資料、方法上的諸多掣肘，影響了明清與朝鮮之關係史研究的深入。孫衛國著《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——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(1637-1800)》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，以下簡稱「前著」)視角獨特、觀點新穎，使用大量域外文獻和中朝日西文論著，能站在朝鮮的視角去思考和分析問題，運用了文化心態分析的方法，¹呈現出由表及裡、見微知著的面貌，為明清中朝關係史研究帶來了一種新的研究範式。作為前著的姊妹篇，《從「尊明」到「奉清」——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(1627-1910)》(以下簡稱「孫著」)新近付梓。孫著繼承在視野、資料和方法上的優勢，從

2018 年 12 月 27 日收稿，2019 年 3 月 9 日修訂完成，2019 年 7 月 11 日通過刊登。

* 作者係曲阜師範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副教授。

Zhang Guang-yu, Associate Professor,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College, Qufu Normal University.

- 1 參見左江，〈歷史表象的文化心態——孫衛國《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》讀後〉，《九州學林》2011春(2012.4): 156-164

強調朝鮮如何「尊明反清」轉為發現其如何「尊明奉清」，從多重層面討論朝鮮對清意識之演變，更全面地思考了清代中朝關係史的若干問題。

孫著全書分上下兩編。上編八章，為「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面面觀」，從政治史、思想史等角度揭示朝鮮對清意識的思想文化根源，分析其對清認知與「心態」的變化及原因。

前三章，從朝鮮「小中華」思想的嬗變、箕子崇拜之盛行、關王崇拜之熱衷三個專題，在整體上討論朝鮮「中華觀」之形成與發展，這既構成了朝鮮對清意識的思想文化基調，也深刻反映了對其「尊明反清」轉向「尊明奉清」的影響，體現著朝鮮在固有文化心態與現實利益中的不同抉擇。首章「朝鮮王朝『小中華』思想的心理理念」，首次考訂了朝鮮「小中華」一詞的淵源，認為最初是統一新羅時期由佛教創立。朝鮮前期，「慕華」成為其「小中華」的心理理念；明亡後，朝鮮將「尊攘」作為「小中華」思想的內核。「小中華」思想作為其最重要的政治思想，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。第二章〈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的塑造〉，細緻考察了箕子與檀君朝鮮尊崇的消長。朝鮮因將箕子朝鮮視為其爭取到「小中華」地位的重要保證，故而大力宣揚箕子崇拜，近代以來，又最終選擇了檀君信仰。第三章〈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〉，考察關帝信仰在朝鮮之建立和演變，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朝鮮的對清認識。明清易代後，關王廟地位的提升，背後寄託著朝鮮對明朝的忠義之心和「尊明」情節，也有其激勵朝鮮將士忠義、宣揚正統和維護統治基礎之意。

第四、五章從清的視角考察從明清鼎革到清後期，清與朝鮮之關係的演變，分析清對朝鮮認識的轉變。第四章〈入關前清與朝鮮關係的演變歷程〉，梳理清入關前的對朝關係。清（後金）兩征朝鮮，使得兩國宗藩關係得以表面上確立，也使朝鮮孕育出了「尊周思明」的心態，「成為朝鮮處理與清朝關係及國內政治的基本原則」。（頁 168）第五章〈清朝對朝鮮王朝宗藩政策的演變〉，繼續考察清對朝鮮態度的轉變，即朝鮮成為「清朝『典型』的藩國」之外因。宗藩關係建立之初，清採取以世子為質、鎮壓反清人士、監視朝鮮等高壓政策，來更好地控制朝鮮。又逐漸對朝鮮轉為「德化政策」，從放歸人質到減免歲貢，優禮朝鮮使節和國王等，想讓

其真正的心悅誠服。

後三章側重從朝鮮視角，深入剖析朝鮮對清意識的微妙轉變、矛盾糾結。朝鮮一面極盡謙恭之狀，認真履行藩國義務；一面長期存在「北伐復仇」的相悖態度。第六章〈清初朝鮮之「復仇雪恥」理念〉，從內因視角揭示了朝鮮對清「復仇雪恥」理念的實質，是受到歷史現實和固有文化理念的雙重影響，其理論基礎也受到春秋大義和朱子學說的深刻影響，又與朝鮮現實糾葛，逐漸演變出了否定「復仇雪恥」的另一種對清態度。第七章〈從丁未漂流人事件看朝鮮王朝之尊明貶清文化心態〉，通過朝鮮對臺灣漂流人的處置，剖析朝鮮對明、清截然不同的文化心態。臺灣漂流人的到來，一方面帶來了南明的資訊，極大地鼓舞了尊周思明理念；一方面，朝鮮顯宗不顧義理派大臣反對，將漂流民送回清朝處死。隨後，朝鮮又因此改變了對臺灣漂流民的政策，在兩國關係極度融洽的時期，朝鮮正祖又祭祀了漂流民，可深刻感知到朝鮮「尊明反清」之心態與行為上的矛盾與反覆。

第八章〈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〉，既是對上編的總結，亦是下編的線索，論述朝鮮對清漫長的「認同」過程。受到朝鮮固有的文化理念與現實利益影響，其對清稱謂日益變化；「北學派」的出現「對朝鮮王朝來說是其逐漸認同清朝的一種標誌」，（頁276）他們對朝鮮奉行的尊周理念提出批評，至純祖以後，朝鮮在與外國簽訂條約時，皆採用清朝年號。但在不同時期、人群的心態上，又與此所謂「認同」存在諸多矛盾和反覆，無論是北學士人，還是民國時大韓帝國的儒林，都依然認為清朝是夷狄，仍以明朝為中華，不承認清朝的正統地位，朝鮮「在文化心態上，並無實質性的改變，而不稱清朝為中華」。（頁287）可見朝鮮對清意識之嬗變未必是線性發展的，即便逐漸認同了清作為宗主國的地位，但內心仍不認同其為中華正統。

中朝的文人交往，是一種更為直接的透過思想文化來瞭解對方的交流。下編「燕行使視野下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」由六個案例組成。孫著描寫了朝鮮後期不同時段「燕行使」與清人之交誼，不僅精準分析人物間的交往事蹟、心態與情感，更細緻剖析這種交往對兩國學術、思想文化，甚至政治層面的深刻影響。六個案例按時段排布，各具特點、層層深入，

可較為清晰的看到其「交往程度逐漸深化，顯示著彼此關係的日益密切，明確反映了朝鮮對清觀的演變」。(頁293)這種「深化」大體表現在：

第一、中朝士人都視對方為「知己」，構成兩國文化認同的一個微觀層面。東亞世界成為一個「情」的世界，兩國士人通過箋注文集、傳遞書信、互贈禮物等方式，長期保持聯繫，還希望他們的感情能傳於子孫後代。兩國士人甚至不必見面，即成為畢生好友。「這種『情』的世界，在以後一代代中朝學人中得以傳承，並且發揚光大，不斷增添新的內涵。」(頁467)

第二、雙方交往的主體從中下層士人到高級官員，從個人自覺到帶有官方意識。北學先驅洪大容僅是使團中的隨行人員，來到中國後，因多忌諱，只能與中下層士人如嚴誠、潘庭筠、陸飛等人交往。隨後，朴齊家、李德懋等與清人李調元等人之交往，仍官階不高。直到紀昀與洪良浩交遊，因雙方均為學界領袖與朝中重臣，二人之交遊體現了中朝士人交往的變化。朴趾源之孫朴珪壽作為要臣，在北京結交了很多清朝高官，因共同面臨著西方與日本的威脅，他與清人之交往「甚至還有著王朝的意志」。(頁467)朴珪壽弟子金允植來到中國後，通過李鴻章等人，積極學習洋務，為朝鮮近代開化尋求富國強兵之策。表明兩國士人交往已然官方化，朝鮮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清朝。

第三、兩國士人學術思想的交融愈加和諧。洪大容不僅對朱子學頂禮膜拜，還展示朝鮮「衣冠制度」之「優越」，試探清人的態度，交流還有些拘謹。朴齊家等人通過邀請清人評點文集，在朝鮮聲名大噪。此後，「朝鮮文人將自己的詩文送給清朝文人評點，幾乎成為一時風氣」。(頁389)紀昀與洪良浩兩人的交遊「從一個層面上也反應了當時朝鮮學界對清朝學界的認識與推崇」，(頁401)洪良浩的「漢學」造詣、對「西學」的關注，體現「中朝兩國的學術思想又走向了同一個類似的世界」，(頁405)反映朝鮮士人對清認同的不斷加深。

第四、中朝學術文化交流雙向化。一方面，「乾嘉學術與朝鮮學界間有著十分密切地關係」。(頁315)洪大容就表現出了對清代大儒相當關心，且「對於王陽明的評價還高於清朝士人」；(頁312)洪良浩還有小學著作，並與紀昀討論「西學」，體現了兩國學術交流的深入。另一方面，朝鮮士

人屢次求得清人評點文集，同時評文作序的清人，也得以在朝鮮學界有所影響。張曜孫及其家人請求朝鮮學人金正喜等作序，李尙迪還幫助張妹將詩文集傳入朝鮮，「這是一種文化的回流，同時更是一種新的交流方式」。（頁446）

第五、兩國士人的交流日益深入。一方面，從朝鮮士人單方到雙方都積極主動，洪大容希望驗證和消除內心中的諸多困惑，也希望為朝鮮的改革謀求理論依據，故而十分主動。北學士人亦是先通過文集結交清人，而後親自赴中國拜訪；洪良浩與紀昀交往時，雖洪良浩更為主動，但紀昀也有結交朝鮮友人的願望；李尙迪雖在朝鮮身分卑微，卻深受清人的尊重，受邀參加文人雅會，文集甚至得以在北京刊行，這反映出清朝學人對與朝鮮士人交流的渴求。張曜孫多次請朝鮮人為其及家人文集作序，甚至讓其幫忙傳到朝鮮，是為新的交流方式。另一方面是交誼群體擴大化，如李尙迪廣結中國官員，使他與清人的交往呈現出群體化趨勢；李尙迪等還與張曜孫家族之人交往甚密，「這種交往已不僅僅限於兩位交往者之間的互動，而是兩個家族間的互動與交流」。（頁438）

第六、朝鮮士人與清人交遊，深刻影響了朝鮮後期的政治文化。洪大容以後，北學士人皆積極與清人交往，「在朝鮮的思想界、學術界形成一股新的勢力，在中朝學術文化交流史上也翻開新的一頁」。（頁327）他們發現清朝國富民強，甚至保有中華遺風，而大力提倡實學，反對傳統的「尊周理念」，認為應該向清朝學習。至洪良浩回國上書朝鮮正祖並被採納，「北學」已真正轉化為行動，也「表明北學思想已經為朝鮮士大夫所普遍接受」。（頁413）朴珪壽在「燕行」期間，與清朝士人共同祭拜顧炎武，影響了他的思想，「為他宣導開化思想提供了學術根基和理論依據」；（頁481）他還透過清朝友人關注洋務，「成為朝鮮近代宣傳開化的第一人」。（頁494）朝鮮派金允植長期駐中國學習洋務和跟隨清朝制訂對外政策，表明「清朝成為他們唯一信任的國家，唯一依存的希望」，（頁520）體現其現實層面上的對清觀從「反清」已轉為了「奉清」。

孫著發揚前著的研究範式和特點，廣採國內外文獻，資料詳實，且每一專題都立足前人而有所新發。更為突出的是，孫著在運用「心態」分析

的手法上，更為純熟和細膩，且研究視角能深入到歷史情境中，來尋找朝鮮對清意識形成與嬗變之深層次的原因。

孫著中多次探討了朝鮮對清心態與行為的「矛盾」之處。如在朝鮮後期，兩國關係已非常融洽，但士人依然大講「尊周思明」；正祖國王還參拜關王廟、為因交還清朝而死的臺灣漂流人祭祀，體現了朝鮮官方意識中隱藏的「尊明」基因。孫著中雖多肯定北學士人與清人積極交往的一面；但也指出，即便是北學士人，也並不認同清朝是中華的正統，依然認為清朝是夷狄，關注的多是物質與技術層面的問題而已，在其心態層面，並未認同清朝。

孫著的「心態」研究，亦能發現不為人察覺的一面，如對朴珪壽思想多元性的分析。朴珪壽除積極與清人交往，以圖開化改革外，還默默出資重裝了明朝李太后的「九蓮菩薩像」，可見其內心依然敬奉明朝。孫著由此進一步指出：「無論是尊周派、北學還是開化派人士，對明朝的情感其實基本上沒有區別，有著基本的認同。」（頁488）這種對人物複雜心態的剖析，是細膩而又全面的。此外，孫著還將「心態」研究應用於具體的歷史情境，如分析朝鮮未將北伐付諸實踐之原因；朝鮮顯宗選擇將漂流民送回清朝的原因；北學士人、李尙迪等與清人交往之心境等，可謂精妙。

孫著還多從朝鮮視角深入剖析問題，有助於究其內因，認清中朝宗藩關係的實質。如指出影響朝鮮「小中華」思想的「決定性的因素則是現實政治的要求」，（頁62）解釋了朝鮮對華觀嬗變的原因及其「小中華」思想之實質。朝鮮盛行的箕子崇拜，同是來自現實需求的選擇；朝鮮的關王廟崇拜在前後發生了大的變化，也是其「在朝鮮政治生活的地位有所變化而造成的」。（頁144）同樣，「『復仇雪恥』的旗號，又是他們另一種策略」，是「從文化和禮儀上強化其本身的正統性，以對抗現實中可能的威脅」。（頁229）與其說是忠於明朝，「現實的利益才是最終的根源」。（頁229）孫著還從現實層面，解釋了朝鮮對清意識的選擇和嬗變的原因：是儒家華夷觀、現實正統的需要，尤其是現實政治的壓力。

在讀此書的同時，也偶有未盡之感。第一、孫著認為無論是高麗還是朝鮮時期，多對檀君信仰持否定、懷疑的態度。而有學者認為，在高麗時

期「因為蒙元的侵略引起了民族意識的抬頭，檀君成為克服困難和統一國倫的中心」；且認為「朝鮮王朝按照《帝王韻紀》的紀錄，不動搖檀君地位的自主性。十五世紀小孩的課本《童蒙先習》也認定檀君是韓國歷史的起點」。² 孫著如能再加考辨，似更周全。第二、孫著認為，孝宗繼位後，即堅持復仇「攘夷」，是因為「八年的質子生涯，使得孝宗對清朝積聚了滿腔的刻骨仇恨」。（頁200）但同樣質於瀋陽的孝宗兄長昭顯世子，卻被清寄予厚望，朝鮮上下視其為「親清」，歸國不久即離奇身亡，³ 這對後來得繼大統的孝宗的觸動應是極大的。「尊明反清」成為其維繫王權合法性的旗號，更應是出於現實的抉擇。第三、顯宗與臺灣漂流人的案例，似還有可深入之處。國王無視了某派大臣的意見，既體現了即便同一時期，朝鮮不同群體的對清「心態」也存在差異；也展現了某一時期所謂朝鮮對清的「官方意識」是如何體現的，或湮沒了其他群體的「心態」。

「我們還能把朝鮮看成是典型的藩國嗎？」（頁200）——由孫著可對清代中朝宗藩關係、朝鮮對清意識的嬗變有更為深入、全面的認識。現實層面，朝鮮完成了從形式上恪守宗藩之禮、暗中高舉復仇大旗，到逐漸認清現實，接受了清的統治。從官方意識來看，成為了「模範藩國」；從士人交往來看，自洪大容以後，朝鮮士人積極地同清士人交往，清朝也轉變為朝鮮學習和依靠的對象，即「由反清、仇清、厭清，逐漸過渡到事清、識清、奉清」。（頁526）但在「心態」層面，朝鮮固有的華夷觀深入人心，雖然基本接納了清朝的存在，但絕不承認其為「中華」，直到朝鮮末期，「朝鮮士人都沒有完全放棄『貶清』的意識」。（頁33）即便不同時期、群體的朝鮮人對清態度有過轉變，但仍存在反覆、矛盾、糾結，「尊明」理念從未消失，只是「逐漸由顯性變為隱性」。（頁526）這種「由『尊明貶清』到『尊明奉清』的演變史」無疑是具有多重面向的。

對中朝關係史的研究正轉入微觀，這使得研究者更多的站在當時朝鮮人的視角，深入具體的歷史情境和話語體系中，來分析和探討問題。跳出

2 （韓）林炳禧，《韓國神話歷史》（廣州：南方日報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94-97。

3 參見王臻，〈入清為質——昭顯世子在清與朝鮮關係中的活動探析〉，《廊坊師範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33.3(2017.9): 46-50。

中國本位，才能真正把握中朝關係史中最細微、最接近真相的部分，推動有關研究的深入。「對於中國歷史上宗藩關係的研究……在文化心態與認同的層面，能使我們更能深刻的理解雙邊的自我定位，也更能體會清代中朝宗藩關係深層的不太為人知的一面。」（頁 258）孫著將微觀的「心態」發掘與宏大的論述視野結合起來，剖析清代中朝宗藩關係的建立過程，從而更完美地呈現出對這一歷史多面向的認識與闡釋。孫著立體化地剖析朝鮮「官方意識」及士人對清「心態」與認知的演變，發現其不僅受到外部之清對朝鮮政策的影響，而更多地受到朝鮮的固有文化心態、現實政治利益等內因之驅動，從而在朝鮮的不同時期、群體中，既有對「旗號」與「話語」的艱難抉擇，也伴隨著對清認知與「心態」的種種矛盾、糾結，深刻影響著中朝宗藩關係的發展與走向。